

困顿与涅槃： 抗战时期国立山东大学的内迁与复校

胡孝忠 秦丽媛

摘要：国立山东大学系全面抗战前13所国立大学之一，也是唯一一所停办又复校的国立大学。在抗战初期，学校从青岛通过陆路、水路辗转迁至四川万县，校产损失惨重。暂时停办后，部分校产又被借用于他校，教职员工被安排到国立编译馆工作，学生并入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成立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负责校产保管和师生后续安排。经过多方努力，国立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学校发展重回正轨。

关键词：国立山东大学；高校内迁；林济青；万县；国民政府教育部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1.04.018

抗战初期，大批东部高校迁往西部，尤以迁移四川省（包括今重庆市）者居多。其中，国立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国立山大”）就是内迁洪流中的一所著名高校^①。但现有研究资料对国立山大内迁的决策、经过等往往语焉不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②。鉴于此，笔者拟结合档案、报刊等史料和校友的回忆，对这一影响中国教育和高校命运的重大事件予以重新梳理，深入剖析其中的管理机制、制度设计、央地关系、师生贡献、成败原因、人物评价等问题，以为今日之借鉴。

一、内迁洪流中的国立山东大学

（一）战局骤变，仓促备迁

国立山大内迁正好处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期间，国内形势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急转直下。1937年10月，侵华日军由津浦铁路南下，入侵山东德州，12月13日攻占南京，12月27日占领济南。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以坚持长期抗战，但部分重要机构并未直接迁移到重庆，而是于12月初迁移到武汉。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10月25日，日军进入汉口，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国民政府对战争的长期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才仓促制定了一些与高等教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考古与历史学学科高峰计划建设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经验”子课题“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研究”（skyzd201912）。

作者简介：胡孝忠，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济南250100；huxiaozhong@sdu.edu.cn）；秦丽媛，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lyqin@sdu.edu.cn）。

① 本文所说的“内迁”，既包含向安徽、南京的南迁，也包括沿长江向重庆、沿铁路向西安的西迁；“抗战”指全面抗战时期（1937.7.7-1945.8.15）。

② 相关研究成果有：《国立山东大学校刊·复校纪念专号》刊发的《校史述略》《本校迁移停办之始末》（1946年12月28日）、张晋三的《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刘培平和方雪的《日本侵华战争与山东大学之变迁》（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编：《弘扬抗战精神 建设美好家园：山东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国立山东大学概览》（青岛，1948年）、《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增人和王焕良的《青岛高等教育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等。

育有关的办法。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各级学校处理校务临时办法》19条,通令南京、上海、江苏、浙江、保定、青岛等地的学校延期开学^①。8月19日,颁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将青岛及京沪(今沪宁)、津浦、胶济三线视为战区^②。国立山大当时地处青岛,代理校长是山东省政府委员林济青^③,他遵命推迟开学^④。

1937年9月,国立山大全体学生恳请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速令学校迁移合并成立临时大学,而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则持反对意见,说:“山大系山东多个专科学校合并的,文物、图书、仪器,均为山东资产,不能外流”,遂有迁移鲁西单县之议。师生均持反对意见,斥为近视,决心长期抗战,群情激昂^⑤。10月2日,全体学生第二次上书王世杰,言明单县位居鲁西,靠近军事要点,交通不便,且无合适校舍,建议在可能范围内速谋一劳永逸之计。在校教职员工也表达了同样的诉求^⑥。

1937年10月16日,王世杰发电文给林济青,要求学校务必立即将设备迁往西安,转运车辆应就近解决^⑦。10月17日,学校遵照该指示,分别联系津浦铁路济南站、陇海铁路徐州站,请求拨给车辆将先前存放济南的仪器、图书等押运西上^⑧。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于10月12日、11月5日分别与铁道部、陕西省教育厅联系,请求迅速拨付车辆协助学校物资转运陕西并代为寻找合适地方暂时存放^⑨。可以说,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学校都在积极为迁校西安做着各种准备。无奈战局危急,国立山大不得不在10月下旬停课,原拟迁往陕西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二) 随行随驻,终抵万县

经国立山大申请并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国立山大决定迁移。1937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文给安徽大学校长李顺卿,告知国立山大校长林济青即将抵达安庆面谈,希望尽可能予以协助^⑩。11月7日,国立山大去函安徽大学,告知对方有关物资已起运菱湖公园安徽大学校址并派王志超教授前往筹备^⑪。同日,林济青呈报王世杰说,国立山大“已借妥安徽大学一部房舍作为临时校址。现图书、仪器等已分别由青济陕各地起运前往”,请求准予学校迁往安徽并得到安徽省政府的大力协助^⑫。学校有关经费则由青岛中国银行免费汇兑到安庆中国银行^⑬。11月14日,林济青呈报王世杰,已派人赴安徽筹备及运输之前或转运陕西或留存青岛的图书、仪器,济南、浦口均有专人负责转运,留存青岛的校产也已派专人驻校保管。11月15日,应林济青的要求,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发文给安徽省政府、安徽大学,要求他们分别给予协助。1937年11月上旬,国立山大师生分批离开青岛,临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 1919-1949》,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73页。

② 《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页。

③ 1937年10月,学校呈送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山东大学职员履历清册》,内有代理校长林济青履历:林济青,男,48岁,山东莱阳人,美国理海大学硕士,山东矿业专门学校教务长兼主任、教授,私立青岛大学校长兼教务长,私立齐鲁大学代理校长,山东省政府委员。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4-002。

④ 暑假时,学校已开始将仪器等装箱准备运往济南,只是决定推后开学,故呈电文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电陈本校因时局影响,改定九月廿三日开学,廿七日上课,并拟续招新生”。9月9日,部长王世杰等发文回复:“准予照办。”(《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⑤ 张晋三:《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第15页。

⑥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⑦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⑧ 《为本校一部分图书仪器运陕函请免税放行的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12。

⑨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⑩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⑪ 《本大学请准迁皖派员去安徽大学接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14。

⑫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⑬ 《请予免费将本校公款汇往安庆》,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17。

行前发表《国立山东大学迁皖留别各界启事》与《林济青启事》^①。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国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办法》，学校紧缩开支并定于12月5日在安庆正式开学，6日复课^②。

然而在安庆开学不到一周，校长林济青再次请求迁移。1937年12月11日，他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说，“本校教授等因时局关系，建议即迁宜昌，抑常德或邵阳”，之后得到即刻迁往万县的批示^③。可以说，国立山大迁移至万县，多次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并遵从了有关指示；校址的选择也是官方主导的，而教授们更多关心的是学校的前途命运。

经与四川省政府驻武汉办事处协商，校方派遣教授郭本道，职员王经纶、阮介人携带工友3人前往万县勘察校址^④。1938年2月12日，学校向万县公署和警察局发函，告知对方学校教职员、学生已陆续到达万县，国立山大即将迁入阆洞子石家庄新校址开课^⑤。对迁校万县，时任化学系助教的郭质良另有说法，说他们在安徽大学暂住时遇到四川将领杨森，因杨将军说他在四川万县防地有一别墅可以暂住^⑥，郭质良等人方来到万县。住下以后，他才知学校原有先迁安庆、再迁万县的计划。

1938年2月12日，校方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曰：“本校教职员、学生已到万，借定城北石家庄为校址，筹备就绪，定于本月十四日复课。”^⑦于是，学校开始了内迁途中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复课。

2月2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秘书黄龙先前往万县国立山大临时校址办理接收事宜，同时发布学校暂行停办办法^⑧。3月，又有一批师生抵达万县石竹轩临时上课地点，但不久又遭停课。对此，晚到者曲继皋回忆说：“外搭蓆棚作临时课堂，第三批书已运到，准备上课，仅上课几天，[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散”^⑨。于是3月15日，国立山大在万县暂行停办。3月23日，黄龙先函告国民政府教育部说，本校学生拟从万县乘坐轮船前往重庆，请求准备临时住所；随后得到回复说，已与求精中学接洽^⑩。学生指定并入国立中央大学，在校教职员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另行分配工作。该年6月份，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免除林济青的国立山大代理校长职务。

二、师生、物资的迁徙与流失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资是大学办学的必要前提，学校较早筹备将物资迁移到安全之处，但因种种原因，物资最后被借用于多个单位。师生是大学的办学主体，他们在内迁途中的流失及去向，无疑会影响到学校的发展和声誉。

(一) 物资的迁徙与流失

1. 省内暂避，前期迁陕

为应对战争影响，学校先后将物资装运到青岛、济南的安全地点，后又将一部分运往西安，因时局动荡再转往安庆，可谓一波三折。

1937年暑假期间，学校开始将图书、仪器装箱，做迁移准备。8月19日，农学院职员李韵涛与物

① 《国立山东大学迁皖留别各界启事》，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24。

②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③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④ 《为迁校装运货物之有关文件及信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9。

⑤ 《为迁校装运货物之有关文件及信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9。

⑥ 郭质良：《魂系祖国——简记我之化学生涯》，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02页。

⑦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⑧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⑨ 曲继皋：《抗战前后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山东大学校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46页。

⑩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理系助教兼掌管全校仪器的佟震西(士虢)开始在济南火车站卸载由青岛运达的2车仪器、图书,共225箱。但因阴雨天气,运件回济南(黄台站东)的农学院进展十分不顺^①。9月11日,校方函告国民政府教育部说,学校在青岛时局紧张时已将重要仪器、图书、文卷等装240余箱运存济南的农学院,以备万一。待日侨撤退、情形和缓,即于该月23号开学,选择其中授课必需的运回,其余的看情形再定^②。10月5日,李韵涛奉学校指派联系济南将军庙街天主堂主教,想借用洪家楼教堂房舍存储本校的仪器、图书^③。10月14日,学校函告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说本校投保的图书、仪器等已迁到安全地点:一部分保存在济南洪家楼天主堂,一部分存在青岛德商美最时洋行仓库^④。同日,学校函告胶济铁路管理局,告知对方:本校停课迁移西安,仪器等装箱完毕,与前存济南的仪器设备共700余箱,请拨付10辆空车以便近期运达陕西^⑤。最终,学校先派文牍课事务员、曾任邹县县长的臧家祜运送图书、仪器由济到陕;遵照部令由迁陕变迁移安庆后,又派臧家祜将该批物资装车改运,11月15日离开西安,17日到达汉口,但所需运输经费大大增加了。对此,臧家祜作了请示汇报,大意是招商局将这批物资从汉口轮运到安庆有困难,学校需再电汇法币千元,不够的话他个人先行垫付钱款^⑥。12月3号,国立山大发函给招商轮船局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意是:学校拟迁安庆,箱件仍滞留浦口、下关,因时局关系暂时转运汉口,特派事务课事务员王乃栋赴南京押运,望两单位协助。12月9日,林济青电文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本校仪器、图书仍在京,已加派专人前往,祈迅电后方勤务部协助速运。”^⑦随后得到该部“请段次长与林校长在汉[口]商洽办理”的批示。

2. 西进南下,前路多艰

学校先后共运出4批物资,由于数量大,路途远,在运输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未能如愿以偿地全部保留下来。

关于前三批物资的数量和路线,说法略有不同。《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记述说: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即转运万县(宜昌);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运至汉口,转运万县。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国立山大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未能运出的财产,包含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⑧而时任图书馆职员曲继皋则回忆说,所有图书共分三批运走,第一批是装火车西运,第二批是由水路途经南京,第三批是同师生一起走的。结果第一批辗转运到湖南蓝田,奉命交蓝田师范学院接收了^⑨。负责在校点查、装箱、看守的王云浦(王乃栋)也说,学校在奉令之初即将所有仪器、图书、标本、文卷及办公用品等分别制箱,共计1000余件。除第一批246箱运至济南后由李韵涛设法转运西安外,余件因校址未定,在青岛辗转存放,历时2个月,至9月下旬开始南运,学校特派吴敬寰^⑩驻南京负责办理运输事项,事务课人员未参与其事。^⑪吴氏跟林济青是燕京大学校友和齐鲁大学同事,林济青绕开事务课人员而对其委以重任,结果事情并未办妥,甚至箱件有失。有关详情如下:

① 《本大学以时局紧张筹拟西迁四川省派员前往万县勘划校址等有关文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10。

② 《国立山东大学现存济南农学院各件清单》,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08。

③ 《以时局影响本校仪器图书拟在济农学院妥存李韵涛前往接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09。

④ 《迁校西安先运前存济南仪器的有关公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6。

⑤ 《迁校西安先运前存济南仪器的有关公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6。

⑥ 《迁校西安先运前存济南仪器的有关公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6。

⑦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⑧ 《山东大学百年史》编委会:《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⑨ 曲继皋:《抗战前后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山东大学校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45页。

⑩ 《国立山东大学教员清册》(1937年):吴敬寰,男,37岁,山东泰安人,燕京大学理学学士和硕士,曾任齐鲁大学物理副教授兼无线电专修科主任,1936年8月到国立山大任教。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4-002。

⑪ 王云浦:《本校迁移停办之始末》,《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第7、8合期。

(1)第一批箱件运到临湘再转运万县。国立山大暂行停办后,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去函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将国立山东大学寄存临湘之电机、抽水机等机器及化学药品等一并拨归本校保管使用”。1938年8月8号,该校得知“国立山东大学寄存临湘之箱件,已由本部派员前往移运湘西存储,作为设立国立师范学院之用”^①,其中的“湘西”指湖南常德的桃源县。但这一批箱件最终并未给国立师范学院借用,而是被运到重庆。校产保管处制定的1937年度概算书“岁出临时门”有火车运费、轮船运费,从临湘材料库装运火车至岳阳运费120元,岳阳转宜昌、万县,最后运抵重庆轮船费1500元^②。时任化学系助教郭质良回忆说,这批箱件系学校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疏散迁移,先将重要仪器、设备分别装箱,其中化学部分由他押运至济南的农学院暂放,后听说运到湖南岳阳车站而散落。^③散落岳阳车站这批箱件就是临湘这批,因为临湘县属于岳阳管辖,有火车站设于临湘。

去南京抢运第二批箱件未果的王云浦幸运搭乘一辆兵车转往汉口,见到全校同人,准备前往万县闻洞子石竹轩开学。由西安转来的仪器等件200余箱,尚存于车站。王云浦乃商请林济青同意,当即雇船转运宜昌,由李韵涛负责由宜昌雇船运往万县。^④此即学校西迁第一批箱件。

第一批箱件中的化学系物资走水路。美籍华裔科学家汪志馨教授于1937年从国立山大化学系毕业后就留校任助教,这年夏天一直在校包装仪器及化学药品,准备西迁,“直到8月才离开青岛,由上海、宣城、合肥到安庆山大临时校址。不久又随校迁到武汉、宜昌至四川万县”^⑤。到万县时,汪志馨和郭质良才开箱检查运来的仪器和药品。此时,第三批16箱物资,也经汉口转运到万县。

(2)第二批箱件在南京浦口车站丢失。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山大迁至安庆,学校遂于11月5日分别去函津浦铁路济南站、浦口招商局请求分别拨发车辆和轮船先陆路运到南京再水路运去安庆^⑥。1937年11月6日,王云浦偕同员工50余人由青岛出发,成为第二批内迁人员。到南京后,王云浦见到运抵的箱件约有800余件,分别堆积于下关码头及浦口车站仓库内,被吴敬寰告知一二日内即有船装运。王云浦等人不便插手,20余日后抵达安庆。林校长也到安庆,得知吴敬寰已携眷返济,催促王云浦速返南京抢运所有箱件。王云浦复登船东返,而此时已无法回到南京。第二天早晨倭寇占领南京,本校所存箱件均沦于敌手。^⑦张晋三则说,这批箱件丢失是听说“苏嘉战役失利,当局下令,限三日内各机关学校单位一律撤出南京。闻耗之后,各机关抢征舟车,于是水陆梗塞,客运停顿。山大无术,遂尽弃图书仪器五百大箱于浦口车站,押运职员潜逃归里”。^⑧自“七七事变”到1938年12月底,“全国高校中14校受极大之破坏,18校无法续办,73校迁移勉强上课。以国立学校言,损失图书1191447册……例如国立山东大学之图书仪器八百箱,中有藏书76724册,均在浦口车站全部损失”^⑨。总而言之,由于战事的影响,加之林济青用人不当,没有妥善安排押运团队;吴敬寰擅离职守,未能完成既定任务,导致此批物资的损失。

① 《关于将国立山东大学寄存电机、抽水机及化学药品拨归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使用的呈、指令》,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1260002009600000018000。

② 《为送改编临各费预算概算呈请鉴核示由》,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6-006。

③ 郭质良:《魂系祖国——简记我之化学生涯》,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301页。

④ 王云浦:《本校迁移停办之始末》,《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第7、8合期。

⑤ 汪志馨:《怀念母校,永志不忘》,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296页。

⑥ 《为本校一部分图书仪器运陕函请免税放行的函》,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12。

⑦ 王云浦:《本校迁移停办之始末》,《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7、8合期。

⑧ 张晋三:《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第17页。

⑨ 《教部发表高教文化机关损失》,《申报》(上海版)1939年3月7日,第7版。

(3)国立师范学院借用第四批箱件。第四批箱件即从青岛出发的最后一批物资,此前研究从未提及。学校办事处迁到汉口的黄陂路44号,校方发现1937年12月初最后从济南运出箱件是经津浦路南下的,车号为17171、17172两车共191箱还未见下落^①。但这两车箱件实际上后来被辗转保存在了湖南常德的桃源县。1938年9月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函告国立师院廖世承院长说:“山东大学及安徽大学存在桃源之仪器、校具已有部令借予师院应用。”9月27日,师院办事员薛炽涛赴桃源设法起运,在常德雇用民船拖运。10月8日,两校仪器校具开始在桃源装船,增雇两艘大船,后在湘潭改装31艘浅水民船。运船经过娄底,于11月3日到安化县蓝田镇,历时21天。两校仪器、校具等木箱320件,铁床260张,铁器130件。^②对此,1939年7月26日国立山大相关财产详册记载曰:由青岛^③最后运出两车箱件,奉令交存国立师范学院186件,陕西教育厅机件23件,因未开箱,目前无从会点^④。这份详册充分证明济南运出的第四批箱件确实存在,而且大部分运到了蓝田的国立师院,剩下的23箱后来借给国立西北工学院。

1938年11月,国立山大仪器箱件及铁器运到蓝田,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督运委员洪韵、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等人组成检收委员会清理、检收。至1940年6月检收完结,造具清册4份^⑤,再次证明了这批箱件的最终归宿。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视察校产保管处,认为国立山大物资因抗战内迁,途中遭受损失,但“运抵万县者,为数尚属不少……而便利他校教学实验及研究之功绩,亦未可泯灭”^⑥,对学校内迁物资作了一个公允评价。

(4)物资损失统计。国立山大因内迁而导致物资损失惨重。学校原有校产较多,1937年内迁前有校舍1411间,价值法币1809010.40元,可容纳3800人;有图书87805册^⑦。到1940年6月,点交国立中央大学借用者为120箱,原值法币188722元;点交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借用者为54箱,原值法币53881元;点交国立中央图书馆借用者为76箱^⑧,原值法币89732元。交国立师范学院借用者为186箱,交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者为23箱,皆未点查计算原值。由校产保管处保管的校产除文卷19箱外,其余为家具、器皿及零星机件、书籍等,总值约合法币2000余元^⑨。此前运出青岛的共1110箱,减去此报告提供的478箱,共计损失632箱,损失近六成。截至1938年底,内迁的18所国立高校的财产损失总计高达法币2249万余元,其中国立山大财产损失法币361万余元^⑩。1939年7月,黄龙先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山大损失已近法币363万元。具体损失见表1。

① 《为迁校装运货物之有关文件及信件》,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7-009。

② 诸懋孚:《筹备日志》,《国师季刊》1939年第1期。

③ 注:本批物资应以1937年12月迁徙途中校方问询铁路局函件所述为准,即从济南出发。若从青岛出发应先经过胶济铁路。

④ 《国立山东大学各项经费表报及教育部核办的来往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2)。

⑤ 《国立师范学院检收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仪器箱件及铁器清册》,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76-001。

⑥ 《教育部派员视察国立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及省立河南大学等校的报告、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983。

⑦ 山东大学档案馆编:《山东大学大事记(1901-1990)》,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⑧ 以西文书籍为多,中文书籍约占三分之一,尚有若干善本,1万余册,由该馆派员到万县点收(《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年第1期)。生物系参考书奉令借与贵阳医学院应用,又不幸惨遭火灾。1945年,借存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残余西文书3300余册,线装书5000册交学校驻重庆办事处再运回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概览》,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出版组,1948年,第40页)。

⑨ 《教育部派员视察国立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及省立河南大学等校的报告、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983。

⑩ 顾毓琇:《抗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教育通讯》(汉口)1939年第5期。

表1 国立山东大学财产损失统计(截至1939年7月)

损失物品存放点	分类	单位:法币元	备注
青岛	房产	2912580.43	其中,济南、青岛2处不动产法币3152959.73元,家具、仪器、图书等法币476863.1元。
	家具杂件	72116.08	
存青岛及转南京未经运出	仪器机件杂品	151385.41	
	中西文图书	206218.76	
济南农学院	房产、林场	240379.30	
	家具、图书、仪器、标本	47142.85	
总计		3629822.83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2)。

(二)内迁师生流失及分布

内迁途中或到万县之后,部分师生员工离开学校,融入西部各行各业,对西部地区的科教文卫工作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师生人数及迁移路线

1937年内迁之前,国立山大有教员80人、职员49人,共129名^①。计有文、理、工3院9系,在校生517人,另有10多位旁听生^②。该年暑假正值华北战事紧张,所以秋季学期开学时,注册的331名二年级以上学生中返校者不足200人,本校生借读外校、外校生借读本校者有10-20人;计划在南京、青岛、济南3地投考的635人中录取80名左右^③。但内迁时师生人数已大大减少。

内迁师生从青岛出发,沿胶济、津浦铁路到南京浦口车站,一部分乘坐江南轻便火车西去芜湖,另一部分沿长江水路进入川东万县,最后沿长江到重庆。师生沿途驻足的主要城市有济南、泰安、徐州、蚌埠、南京、芜湖、安庆、武汉、沙市(今荆州)、宜昌、万县(今万州),实际开学的3个地方则是青岛、安庆和万县。

师生同时内迁,教职员与学生人数参半,学生均系自费^④,是首批出发。据随迁中文系学生张晋三回忆,9月中旬某日^⑤,首批出发学生仅男女120余人,乘胶济路西去,宿济南商埠某小学中。1周之后,乘津浦路局派“蓝钢皮特别快车”抵泰安站,在徐州车站换车后,于次日抵蚌埠,再换车后抵浦口。宿南京7日,某晚搭江南轻便火车西去芜湖,寄寓圣雅各中学。羁留月余,再移安庆。未满月就西去汉口,宿于武昌黄鹤楼故址之南某小学中待命。……再发汉口,西抵宜昌,寓某校月余。校方于是百计求轮,始进三峡,过巫山,千里达万县,暂息万县中学。月余,校址觅定在西山公园之西,地名闾(同“钻”)洞子者,有巨型别墅石竹轩。学生住宿其旁的程氏祠堂。不及1个月,奉令并入本部在重庆西郊40里沙坪坝松林坡的国立中央大学。^⑥

当时,身为中文系大三学生的徐中玉也参加了内迁,他曾在信中回忆说:

1937年11月山大决定南迁时,先已决定迁在芜湖,并非先定济南和南京。在济南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即火车去南京。我们一路上并未受到轰炸,但确已很紧张。到南京后,教育部预定立

① 《山东大学教职员履历清册》(1937年),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4-002。

② 褚承志:《国立山东大学》(下),《山东文献》第6卷第3期,台北:山东文献社,1980年,第22页。

③ 《国立山东大学现存济南本校农学院各件清单》,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08。

④ 学校曾在1937年10月8日去函胶济铁路管理局,请求准予学生免费乘车,获批准。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676-011。

⑤ 按:可能有误,应在11月初。

⑥ 张晋三:《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第15-18页。

即让我们去芜湖,就安顿在那所中学里。……没几天教育部要我们即转去江北的安庆,也有一所中学给我们暂住。分明也是临时安排,并非改迁安庆。在芜湖我们只停约十多天,去安庆后停约十天,就转去武昌,仍是待命性质。那时同行山大学生不足100人,只有几位助教同行,一个教授也没有。轮船缺乏,只要买到了船票,就立刻再去武昌。迁去四川的万县,就是教育部重新决定的。^①

张晋三、徐中玉当时均为学生,不可能了解学校决策层的意图和决策经过,加之时间久远,所以对有关细节和政策难免记忆不全或有错漏,但其回忆与档案记载大致吻合。

师生抵达武汉后,沿途船只拥挤,故分批起行,汉口、宜昌等地节节不顺,1938年2月中旬才到达万县,有教职员19人、学生百余人。此时,临时上课地点——石竹轩别墅环境优雅,代理校长林济青和有关教师及部分图书、仪器已到,同学也陆续汇集至300余人,于是在该处暂时复课^②。由此可知,到万县的学生已达内迁前的五分之三,比较可观。

2. 教职员的不同去向

抗战前教职员参照并享受国民政府公务员福利待遇,但战争对其影响非常大。1937年,黄龙先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校教员30余人需发放由青岛来万县的旅费,每人100元;随后得到回电批准;从校费中开支^③。1938年3月8日,学校教授代表汪公旭等称教职员随校迁徙,路途颠沛,经济异常困窘,咨询救济办法^④。3月15日,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教员旅费由学校从现余经费内酌量津贴一部分,听候分配工作,为期1个月,其间发给生活费^⑤。

1938年2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山东大学结束办法》,要求学校将在校教职员造册送交该部,由该部另行安排工作,发给生活费^⑥,结果大部分教职员被分配到国立编译馆,如佟震西(士虢)等。抵达重庆的教授、助教报到后,于1938年5月16日开始工作,主要从事编辑或翻译工作。因移交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箱件的清理需要,又有5位助教被借用去清理在万县校产,为期3个月^⑦。图书馆职员韩孝儒、钟孝先则被介绍到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⑧而更多教师加入了西部其他高校,如中文系知名教授叶石荪赴国立四川大学任教育系主任;颜实甫任四川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后为四川教育学院院长;游国恩、萧涤非、彭仲铎几位老师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⑨;外文系李茂祥教授转去国立中央大学;数学系李珩教授、体育系主任宋君复教授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教授;生物系童第周教授先被分配到国立编译馆,随后被聘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又在迁到宜宾李庄的同济大学任理学院教授,最后担任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教授。

另外,部分国立山大的老师自主创业,如化学系主任汤腾汉教授等内迁至成都后重建了永生化工

① 胡孝忠:《“责任”与“信史”——著名校友徐中玉、李嘉泳先生再忆国立山东大学校史》,尹作升、李平生主编:《斯文一脉》上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6页。

② 郭质良:《魂系祖国——简记我之化学生涯》,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303页。

③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④ 《关于本校停办后对教成(职)员的工作安排及生活救济等问题的请示》,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4。

⑤ 《对国立山大教员的工作安排及生活补助等问题的指示》,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6。

⑥ 《山东大学结束办法》,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3。

⑦ 《教育部及会计室核办国立山东大学各项经费事宜的文书表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1)。

⑧ 《关于人员工作安排及图书、财产整理问题的来往信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8-017。

⑨ 胡孝忠:《“责任”与“信史”——著名校友徐中玉、李嘉泳先生再忆国立山东大学校史》,尹作升、李平生主编:《斯文一脉》上卷,第226-227页。

厂,又在重庆建立了中央制药厂。两厂的技术骨干都是国立山大的师生和校友^①,使抗战时期工业和医药事业的产、学、研密切结合,为西部科技和工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有力支援了抗战,改善了民生。

3.学生的去留选择

内迁途中,学生生活异常艰辛。学校想方设法解决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在内迁安庆时已发布公告,学生因拮据可缓交各项费用,也可以下学期补缴。1938年2月18日,学校致函万县县立中学、文昌宫女子小学,感谢对方借予宿舍^②。

因生活艰难,学生或去或留,可以自主选择。《山东大学结束办法》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如指定学生并入国立中央大学肄业;愿改入其他大学者,也可由学校汇总、报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送;遣送学生至他校肄业,应按路途远近给予旅费等^③。因此,中文系学生徐中玉等顺利转入国立四川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就读。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学校在暂行停办当天(3月15日)发函(万字第9号)给国立中央大学,将郭起龙等529名学生并入该校肄业,在学证书、历年成绩单等另函汇送^④。最终,学生实际转入中央大学者113人,借读生5人^⑤。

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学生的生活作出了较为周到的部署,安排战区学生就学并以“贷金”名义予以资助。1938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处理战区退出学生办法大纲》13条,对各级学校学生愿继续学习的可转学或借读作出安排,专科以上学生可申请贷金。^⑥5月5日,国立中央大学遵照《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将所收国立山大需要救济的学生杨惠春、李嘉泳等75人,造册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每人每月发给膳费贷金6元、零用贷金2元,学费贷金每学期10元。与中大学生的待遇一样,自4月份起按月汇发^⑦。对此,张晋三回忆说:“山大学生为当时所谓流亡学生(家乡沦陷者),教育部发给贷金(无息),每月膳费6元,零用2元,冬给衣用20元。师生每人每月供所谓平价米百市斤(可抵市米价1/3),但大都发霉,难以果腹”^⑧。关于集中在武汉的数百山大师生的去向,褚承志也曾谈及。他说,一部分学生跑到延安,一部分学生或从军或另谋出路,一部分忠贞好学的则随着学校跑到万县,最后合并到国立中央大学^⑨。徐中玉则回忆说,武汉形势濒危,山大同学感到很困难,有的进了训练班,有的去了山西,有的转学去了西南联大,有的则加入了共产党青年抗日救国团体“民先队”或奔赴延安。外文系学生赵瑞蕻在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温州,组织“永嘉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战救亡运动^⑩。1937年10月,赵瑞蕻进入西南联大继续上学,做了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等原国立山大教师的学生^⑪。学生们借内迁机会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选择也就选择了不同命运。

① 肖寒:《化学制药的开拓者汤腾汉》,《百年山大群星璀璨》编委会编:《百年山大群星璀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0-221页。

② 《给万县中学的感谢信》,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21。

③ 《山东大学结束办法》,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3。

④ 《函告国立中央大学请准予本校学生入贵校肄业》,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7。

⑤ 褚承志:《国立山东大学》(下),《山东文献》第6卷第3期,第22页。

⑥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1919-1949》,第383页。

⑦ 《国立中央大学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十二月学生贷金名册、山东大学学生贷金名册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116(2)。

⑧ 张晋三:《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8辑,第19页。

⑨ 褚承志:《国立山东大学》(下),《山东文献》第6卷第3期,第22页。

⑩ 董宁文主编:《多彩的旅程——纪念赵瑞蕻专辑》,南京:江苏新华印刷厂,2001年,第148页。

⑪ 赵瑞蕻:《碧海红樱忆旧游》,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345页。

三、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

1938年2月2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2月18日训令，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同时附发《山东大学结束办法》，要求1938年3月15日前结束，经费领至当日。国立山大暂行停办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一）停办学校的有关提议

关于学校的停办，有人说是蒋介石提出的，有的说是林济青提出的，有的说是林济青提出后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众说纷纭。

对此，曾任山大副校长、学报主编的童第周回忆说：“刚到安庆，日本人又快打到安庆了，我们又跑到武汉。校长林济青想解散学校，说是没有钱了。我们到银行一查，山东大学还有9万元。校长开大会，刚讲完，我就在会上和校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我们又连续跑到沙市，刚到沙市武汉被炸，到沙市也被轰炸。我们跑到四川万县，在山上找了点房子，开始上课。不久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开会，林济青又提出解散山东大学，蒋介石批准了”^①。

1938年2月5日，林济青确实参加了蒋介石对部分大学校长的训话。这一点，档案材料可证实。国民政府教育部武汉办事处曾给林济青便函：“兹订本月五日下午四时晋谒蒋委员长，即希执事准于下午三时莅临本部集合前往。”^②但并没有史料表明是林济青主动提出解散学校。2月9日，奉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暂行停办山东大学，让学生并入他校，并交给高等教育司草拟具体办法^③。2月13日，学校报告国民政府教育部说：“已在万县城北石家庄觅妥校址，筹备就绪，定于本月十四日复课”；随后得到回复意见，曰：“拟暂存。俟行政院院务会议通过本部所提令该校暂停办案通过后，再行令知”^④。从这些材料，可以合理判断说，学校暂行停办是蒋介石的意思，但具体办法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得到蒋介石认可并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讨论通过的，并非林济青提出来的。林济青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寻找合适校址，准备复课。他在2月23日给陈立夫发电文说：“本校西迁万县，校址择定城北专（钻）洞子石家庄，地隔市区，颇为清静，周围旷阔，尚堪发展，经于二月十四日复课，即将注册选课事宜，办理就绪，并已正式上班。”^⑤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发展空间较大的国立山大并未较多关注，只是批示“拟存”。

综上，暂行停办国立山大绝不是林济青主动提出的，校长提出解散自己领导的学校也不合常情。

（二）暂行停办原因

一般认为国立山大因不遵部令、校产尽失而遭停办，也有的认为是学校因经费紧张而停办。“总计因战事影响而迁移者，凡七十七校，而停顿之学校不与焉（停顿者凡十七校，与迁移者合计为九十四校。俱因战事影响，不能在原地开学）……国立山东大学迁抵万县后，因设备既多，遂暂行结束。”^⑥当时停办的大学有国立山东大学、省立山西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共3所，而只有一所国立大学。国立山大除“设备既多”外，还有一定的经费。《国立山东大学移交款项清册》显示，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每月拨款法币27840.5元。1937年7月到1938年1月，学校共收到法币约136852元。山东省政府自1936年7月至1937年10月，每月给法币15000元协款，种种收入减去开

① 童第周：《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② 《通知林济青前往晋谒蒋介石》，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9-019。

③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④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⑤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⑥ 《中国高等教育设置现状（二）》，《申报》（上海版）1939年6月1日，第13版。

支,共剩法币 64562.46 元。^① 1938 年 3 月 27 日,在万县清查校产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黄龙先写信给该部武汉办事处姚溥臣科长,请派员就近查询核对存款^②,3 项共计法币 5.02 万元。1940 年 6 月,保管处保存校款法币 70523 元,以作清理债款用^③。

到汉口月余,张晋三等“闻[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汉召集各大学校长会议,山大以图书仪器尽失,师多于生,备受指斥,无可为校,应予停办处分”^④。王云浦也认为,校内外人士对当时本校迁运公物处置失宜,均表不满,纷纷责难,致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不明了本校情况,于是转陈蒋介石,并奉令传见林济青校长询问。在全国各大学均择地内迁、积极筹谋恢复上课之际,国立山大却奉令停办,莫名其妙^⑤。曾任教务长的杜光坝也在 1954 年撰文回忆说,当时是因为“国立山东大学以事前未能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将该校迁至后方安全地点,预作必要之准备,致使于战事蔓延及于鲁省之时,该校仓猝[促]撤退,员生多数星散,图书仪器多未运出”^⑥。事实上,师生在万县汇集了 300 人^⑦,图书仪器也有近一半保存下来。所以,以上两种观点皆不成立,我们认为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如下三点:

1. 学校受到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牵掣

国立山大是民国时期大学“国立化”过程中的中央、地方、大学三者之间合作与博弈的典型。林济青及其前任赵太侗均没有处理好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角色冲突,作为国民政府任命官员,他们有必要实现中央政府对大学的全面控制;作为国立大学校长,他们又要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实现“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排斥各级行政的干预;国立大学校长角色要求其保障办学经费,但现状又令其四处筹措经费以实现大学发展,二者之间经常冲突^⑧。

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青岛市政府与国立山大四方不断博弈,在抗战爆发前后尤为明显。1935 年 1 月 13 日,韩复榘力保林济青继任省府委员^⑨,后又连任。1936 年 1 月起,他借故将协款由原来的每月 30000 元减为 15000 元^⑩,致使学校工作难以开展。1936 年上学期,政治风云突变,韩复榘伸手要把山大抓过去,赵太侗校长去南京申请辞职^⑪。1937 年 10 月 22 日,全体教授给王世杰写信说,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历经变故,缔造艰难,似不宜因时局关系听其牺牲。恳求[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尚未沦陷之大学待山东大学,速令校方妥觅校址,设法迁移,并保持其独立”^⑫。校方与国民政府、地方政府及师生之间的种种冲突和矛盾纠葛,制约了学校发展。

1938 年 2 月 18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训令,规定“将国立山大暂行停办,原有经费由国库实支部分,仍照常拨发,由部妥谋支配,作遣送学生、供给教职员生活费及保管校产之用。由省协款,亦应由鲁省拨支一部补助上项费用”^⑬,同时要求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山东省政府遵照执行。事实上,1938 年 4 月山东省政府就因该省大半沦陷、省库支绌,请求停止拨发协款给国立山大,并得到了国民政府

① 《国立山东大学移交款项清册》,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12。

② 《国立山东大学呈报职员生活补助费的文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672(2)。

③ 《教育部派员视察国立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及省立河南大学等校的报告、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983。

④ 张晋三:《山东大学南迁见闻记略》,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岛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17 页。

⑤ 王云浦:《本校迁移停办之始末》,《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 年第 7、8 合期。

⑥ 杜光坝:《忆国立山东大学》,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 274 页。

⑦ 1937 年,国立中央大学在南京的战前最后一学年的学生人数为 1072 人,所以国立山大 527 个学生最终聚到万县 300 人,相比而言不算少,不足以少到暂行停办的地步。同时期西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到校师生才数十人,也并未停办。

⑧ 具体论述和案例见肖卫兵:《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校长角色分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218-224 页。

⑨ 《韩复榘电保林济青补省委》,《申报》(上海版)1935 年 1 月 13 日,第 3 版。

⑩ 《国立山东大学移交款项清册》,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12。

⑪ 水天同:《回忆山大外文系点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山东大学九十年》,第 340 页。

⑫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⑬ 《关于停办国立山东大学的训令》,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4-001。

行政院的批准^①。9月23日,校产保管处主任王志超等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了学校的经济概况,指出该部欠发国立山大经费法币31220元,山东省政府欠拨协款法币75000元^②。可见,学校在抗战初期的应收款项没能得到及时、足额拨发,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发展。

1945年9月27日,留蓉校友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复校,说:“过去山大困于经费,未能充分发展。……此后经费既由中央拨发,自应恢复初名,定名为国立青岛大学”^③。此提议的背景是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确定青岛为特别市,属行政院直辖,直到解放。徐中玉校友说,国立青岛大学需要山东省提供协款,所以才遵韩复榘意思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这都反映了经费在办学中的重要性。

国立山大搬迁期间举棋不定、搬迁过程一波三折、搬迁结局横遭停办,均与国民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干涉、对抗不无关联。当时师生、校友要求学校行政与经费独立,不受地方牵掣,可谓是办学的重要经验。

2. 上下分离,沟通不畅

林济青代理校长期间,与师生之间的互信度较低,信息沟通不畅,产生了不少误会。如1937年10月,全体师生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请示,反对迁校单县;迁移之后,出于维护山大精神的考虑,请求批准学校在可能范围内维持行政上的独立状态^④。10月7日,校长林济青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密电:“藉悉该校有迁单县意,该地交通不便,势难切实开课,该校仪器设备尚佳,须迅为安全措置。部中考虑,以暂迁西安上课为宜”^⑤。对此,教授们似乎毫不知情,深恐迁移再延,无法进行,于是绕开校方于10月9日、12日在青岛两次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早日迁校。10月12日,林济青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速筹学校迁移办法。同日,他得到该部的回复:“课务可照韩主席意暂停。须即将重要仪器、图书迁往西安。倘因搁延而致损失,责任殊重”^⑥。11月1日,全体学生去信国民政府教育部,反映教授星散、同学失所的现状;校方缺乏诚意,玩弄欺骗,迁延半月,一事无成。恳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催促学校向指定地点迁移。待该部令校方迅迁西安,学生们欣慰万分,但看到学校对迁移准备很不积极,大部分仪器、图籍尚滞留青岛、济南二地时颇为疑惑^⑦。11月6日,全体学生又一次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敦请其催促学校迅速向指定地点迁移。也就是说,学校10月初就停课,要教授们离校,校方与师生之间并未就迁校进行很好沟通,第一批学生离校已经是11月初了。学校内部沟通不畅,怨言多多。

3. 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能力欠佳

国民政府教育官员举棋不定,贻误时机。迁校初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没有丰富的统揽全局和面对残酷军事、政治斗争的经验,对突如其来的全国性迁校运动和大量学生处置失当,因此于1938年1月1日离任部长一职。

学校领导能力欠佳。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任命林济青代理国立山东大学校长,学校领导层随之战前大换血。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因与蒋介石的矛盾及抗战不力,在开封被蒋介石诱捕,1月24日在汉口被依法处决。蒋介石很可能因为韩复榘保举了林济青任代理校长,而学校内迁又有一些不如意,故而迁怒于林济青及学校。1938年9月,国民政府审计部审核国立山大收支情况,曾质疑送

① 《教育部及会计室核办国立山东大学各项经费事宜的文书表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1)。

② 《呈覆遵查林前校长济青交待款项由》,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9-017。

③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④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⑤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⑥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⑦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韩复榘丧礼花圈法币 10 元的第 68 号单据。韩复榘为国家民族的罪人,为什么由公费报销其丧礼费^①?这旁证了林济青的政治立场。王世杰部长提出国民政府教育部遴选大学校长的人选标准,一是人与校须相宜,二是要能得到政府的信任通过^②。而林济青只受韩复榘保荐,他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信任,与师生的关系也不和睦等等,均证明此人与学校不相宜。

可以反衬林济青的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罗家伦因参与国民政府高层决策,得以尽早研判形势,将该校迁至遥远的抗战大后方重庆。校址 8 年不变,图书、仪器完整,连畜牧系的数十头牛也运到重庆^③。这充分显示了罗校长的长远眼光和非凡的领导才能。林济青没有像西南联大、华西坝五大学的校长们那样,与其他内迁高校抱团取暖,错失良机。

可以说,林济青虽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但并没有得到全校师生和国民政府的拥戴或高度评价,所以其职务没有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转正,始终是“代理校长”。

四、国立山东大学的复校与涅槃

国立山大在发展良好的形势下骤然停办,令人颇为不解、不胜惋惜。因此,各方为早日复校积极做出诸多努力。国民政府教育部当初也只是“暂行停办”,说明国立山大可以在合适时机复校。1938 年 4 月 14 日,该部颁发《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就明确表示要复校,规定“各暂接机关,应负切实保管之责,使用后所有消耗损失,应于将来山东大学恢复时偿还”^④。1940 年 6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员视察校产保管处并提出意见:“现有校产及保管情形,可酌印清册,送赠前在山东大学任事之职教员,以安慰其关心山大及在该校服务之热忱,并加大其在精神上对于该校之联系”^⑤。

(一)校产保管为复校做好了物资准备

1938 年 2 月 24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派该部秘书黄龙先前往万县国立山大临时校址办理接收事宜,同时下发该校结束办法^⑥,并拟成立“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以下简称“保管处”)。

1938 年 3 月 15 日,保管处成立,处址原设万县国立山大原租校址内。4 月 14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同年 11 月,保管委员会改组并迁往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二办公处。旋即又因重庆疏散,保管处迁至江津县白沙镇^⑦。所谓改组,主要是保管处主任委员由原来的土木工程系教授兼校长室秘书王志超担任改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黄龙先兼任,王圻(原教务长)、张紫雒(原注册课主任)为委员;免去汪公旭保管处委员的职务。该处最初设主任 1 人,委员 2 人,分文书、保管、会计、庶务等 4 组,分理处务。各组共设干事 5 人,助理干事 1 人,书记 1 人^⑧。1940 年 10—12 月,保管处在职人员有 10 人,分别是主任黄龙先,委员王圻、张紫雒,干事李韵涛、王乃栋、曲继皋、孟礼先(原事务课主任)、汪荫林、王培祐、严汉昇。1944 年 12 月,保管处剩有 8 人,^⑨并未满员。1940

① 《教育部及会计室核办国立山东大学各项经费事宜的文书表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1)。

② 王世杰著,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年,第 18 页。

③ 谢森中:《沙坪坝之恋》,台湾《“中央”日报》1993 年 2 月 17 日《副刊》,第 16 版。

④ 《令发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由》,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7-007。

⑤ 《教育部派员视察国立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及省立河南大学等校的报告、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983。

⑥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⑦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⑧ 《教育部派员视察国立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及省立河南大学等校的报告、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1983。

⑨ 《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处职员题名录、产员名册、秦瑜的聘任书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673。

年度,保管处的经费为法币 18000 元。

因战事紧张,保管处职员及留青工友的生活十分困难。1938 年 5 月 7 日,王志超致信黄龙先说,滞留青岛的工友们自青岛沦陷后一直未领到工资,希望给予救济^①。7 月 2 日,驻留长沙的汪公旭委员发信给保管处,催发 4 月下半月及 5 月薪俸以及在汉口与临湘出差(注:提取临湘信件)的垫款,以应急需;又写信给黄龙先秘书要速借五六百元,以解燃眉之急^②。黄龙先兼任主任后,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自 1938 年 11 月起每月增加经费法币 500 元^③,但职员们的生活依然困难。

尽管生活艰辛,但保管处的员工们依旧任劳任怨、尽职尽责。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盘查校产、编造校产清册、保管校产、核发学生成绩单、办理其他与校产有关事项等。1938 年 5 月,曾派员赴国立中央大学查点仪器,赴临湘洽提仪器等^④。9 月 10 日,派曲继皋携带印章赴国立中央大学会签移交仪器、药品清册等事宜^⑤。1941 年 4 月 12 日,派干事李韵涛前往各单位察看所借图书、仪器等保管使用情形^⑥,忠实履行了其职能,为复校做好了良好的物资准备。

(二)复校呼声强烈

1.各方采取行动

学校暂行停办后,校友们没有因此而气馁,而是尽最大努力来争取支持,以图早日复校^⑦。当时,成都是校友大本营,有三四十人,其他人散布在重庆、昆明、西安、兰州、桂林、汉中等地。他们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边集合校友多方奔走以图复校。1940 年 1 月 4 日,国立山东大学同学会在四川三台成立分会,会址设在三台市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五服务团,薛传泗、丁金相、魏兴南为干事。其宗旨在于联络感情,增进互相合作,协助总会谋求母校的复兴与学术的发扬光大。3 月 14 日,他们联合向校产保管处发函,要求母校复校^⑧。1945 年 9 月 27 日,成都校友汤腾汉、丁山、曾省、闻宥、宋君复、汪志馨等 27 人自动组成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复校促进委员会”呈请朱家骅部长,为恢宏山大以往精神考虑,请立即设置复校委员会,仍由杨振声、赵太侔两先生负责领导^⑨。此处未提林济青。与后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提议杜光坝任校长不同,校友们对赵杨两位前校长认可度更高一些。

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决议恢复国立山东大学。1942 年 12 月 2 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请示国民政府教育部说:“为救济青年培育人才计,似有恢复山大之必要”。国民政府教育部一方面复电,认为“恢复国立山东大学一节,目前困难甚多,拟待战事平定后再议”;另一方面,又在 1943 年 11 月电令该部专员徐洽处理此事,最后得到徐洽“山东大学开办,遵伤阻止”的回复^⑩。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通讯处在重庆民权路中央制药厂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复校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富春、吕少恒、宋默庵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递交《为呈请任命校长明令恢复国立山东大学以宏教育事》,认为建国大业急需人才,华北各省有志青年失学者众多,故国立山大复校刻不容缓。附件《国立山东大学复校计划书》提议在青岛复校,建议学院增加到 7 个^⑪。9 月 14 日,山东青年协会请示国民

① 《关于人员工作安排及图书、财产整理问题的来往信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8-017。

② 《关于运仪器之费用及每月发薪问题的来往文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6-003。

③ 《教育部及会计室核办国立山东大学各项经费事宜的文书表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3919(1)。

④ 《为送改编临各费预算概算呈请鉴核示由》,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66-006。

⑤ 《为交接山大仪器药品清册改正册之来往文件》,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J110-01-773-008。

⑥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⑦ 《校史述略》,《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 年第 7、8 合期。

⑧ 山东大学档案馆编:《山东大学大事记(1901-1990)》,第 50 页。

⑨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⑩ 《山东大学改组停办等事宜的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2226。

⑪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政府教育部,要求恢复国立山东大学,造福青年,裨益国家^①。9月20日,保管处主任黄龙先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文,请求全数发还前缴国立山大的印信、契据、文册等。10月4日,山东省复员建设协进会请示朱家骅部长,要求迅速让国立山大复校并在济南增设师范及农医法学院。^②此外,我们认为国民政府恢复国立山大另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要与1945年8月在解放区临沂成立的山东大学相抗衡。

2. 校长人选的抉择与复校建设计划

关于校长人选和复校计划,有多种选择。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并委任杜光坝为校长,理由是此人系国立山大初创时筹备委员,嗣任教务长5年,在山东省各界极负盛誉,且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如任校长则驾轻就熟、易于复校^③。另外,杜氏曾于1937年4月1日起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由此可见,当时山东省提供的候选校长主要从个人背景、声誉、人脉、能力、品德等方面考虑。但国民政府教育部并未采纳山东省的意见,而是在1946年1月委派赵太侗为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赵氏为校长^④。这不仅因为他曾任国立山大校长,成绩斐然,关键是他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对中央和地方情况比较了解。

1946年4月13日,《申报》公布教育经费预算,国立山大在列。赵太侗的复校计划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人事方面,设法请回原教职员,聘请国内外真才实学者,注重研究。(2)校舍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将鱼山路日本人的东亚医科学院及东亚医学院附属医院(即同仁医院)3个地方拨作校舍。(3)院系方面,拟设文学、法学、理学、农学、工学、医学共6院26系,其中新增历史、哲学教育、法律、经济、造船等系。赵太侗特别强调:“本校院系各有偏重,以理学院为本校的基础,法学院偏重于法律系,这完全由于时代的需要才有此决定。”^⑤这与后来“文史见长”的办学特点有些不同。法学院最后没实现,可能是受到经费和时局的影响。

3. 校产接收与人才邀返

校产接收分为青岛和重庆两部分,头绪纷繁。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派国民政府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兼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委员孟云桥负责接收学校在青岛的校产,拨给经费法币100万元^⑥。1946年2月22日,国立山大驻渝通讯处办公地点“暂设于本市两浮支路国立中央图书馆内”^⑦,说明收回在渝校产工作早已在进行中。4月,校长赵太侗在重庆将前山东大学借出图书、仪器接洽收回,装箱运出,以为复校之用^⑧。最终在该年10月,仪器60余箱、图书90余箱从重庆运抵青岛大港码头,再转运回学校^⑨。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准许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收青岛胶州路一号日本人办东亚医专,划归国立山大医学院,但医学院附属医院依克伦院长在接收时受到国民政府青岛市卫生局、市立医院人员及警察的阻挠。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向国民政府青岛市市长李先良交涉,赵太侗校长紧急赶赴青岛,最终收回该房产。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时告知,青大原址所驻美军即将回国,请赵太侗速速赶往青岛主持交涉^⑩。后来胶州路一号房产交还市立医院,将江苏路日本人办的青岛病院改为本校附属医院^⑪。

①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②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③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④ 《校史述略》,《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第7、8合期。

⑤ 刘彬:《关心山东大学的复校——赵太侗校长访问记》,《山东青年》1946年创刊号。

⑥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⑦ 《国立山东大学驻渝办事处关于告知信件投递地址致东川邮政管理局的函》,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340-0002-00474-0100-137-000。

⑧ 《赵太侗飞青筹设山东大学》,《申报》(上海版)1946年6月14日,第5版。

⑨ 《图书仪器由渝运青》,《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第1期。

⑩ 《国立山东大学迁校、复校计划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五-5343。

⑪ 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概览》,第42页。

1946年6月18日,赵太侔来青岛筹备复校,拟设文理工农医5院16系,预定10月间可开学。赵太侔不断收回并增建校舍、医院等^①。11月^②25日举行开学仪式,12月23日正式上课,计招考及分发学生1100人。^③12月28日早晨举行复校庆祝典礼。学校成立文理工农医5学院^④。赵太侔聘请原来教师童第周、丁山、宋君复、徐中玉等回校,又通过徐中玉聘任陆侃如、冯沅君两教授来校任教;从国立中央大学聘来王仲荦等名家。国立山大经过战火洗礼,师资和学生及校产均达到并逐步超越了战前水平,实现了凤凰涅槃。

一所成功的大学,离不开优良的师资、学生、校友和高质量的校产。国立山东大学是抗战期间迁徙路线曲折、校产损失惨重、师生散布广泛的高校之一,经过多方努力最终复校,而且师资和校产等方面都得到提升。本次内迁为西部的科教文卫事业及抗战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作为唯一一所停办又复校的国立大学,国立山大的内迁与复校,显示个人前途、学校发展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Predicament and Nirvana: National Shandong University's Inland Relocation and Resump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

Hu Xiaozhong Qin Liyuan

(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National Shandong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thirteen national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 and it was also the only national university that was closed and resumed.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school began to move inland from Qingdao through land and water, and then moved to Wanxi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The university's property suffered heavy losses. After the university was temporarily closed, the school assets were lent to other universities. The faculty were arranged to work in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while the students were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Chongq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Shandong University Property Storage Office to handle the storage of school properties and the follow-up arrangement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fter many efforts, National Shandong University resumed itself in Qingdao in 1946, and its development was back on track.

Keywords: National Shando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relocation; Lin Jiqing; Wanxian county;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s Ministry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以沫]

① 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概览》,第42-44页。

② 注:应为10月。

③ 《校史述略》,《国立山东大学校刊》1946年第7、8合期。

④ 《山东大学昨庆祝复校》,《申报》(上海版)1946年12月29日,第8版。关于复校的经过和盛况,《国立山东大学校刊》和《山东大学校史资料》《山东大学百年史》《青岛高等教育史(现代卷)》等书刊都有记述,此不赘述。